

沈兼士：“更使后生思老辈”

◎ 浙浙人物 □ 周维强

标题是沈尹默1947年仲夏,在上海得悉沈兼士8月2日晚上在北平家中突发脑溢血去世而赋诗里的句子。诗的前两句是“一朝散手若为情,六十年来好弟兄”。尹默是兼士的二兄,大兄是沈士远。沈兼士,清光绪十三年(1887)7月31日出生于陕西汉阴,祖籍浙江归安,归安人民国后和乌程合并为吴兴,即今之湖州。兼士写字著文常署“吴兴沈兼士”,可知虽然生于陕西汉阴,但还是认同自己是浙江吴兴人。

2002年4月30日,尹默先生哲孙长庆到北师大小红楼访问启功先生,启先生说:“过去实行异地任职,‘三沈’三代人,有两代在陕南为官,家室安在汉阴。按现制算,是陕西籍汉阴人,但他们遵祖制,一直(署)用吴兴(籍)。如果有机会,将把这些(情况)用小字写在匾额上。”——今日湖州也始终尊士远、尹默、兼士“三沈”为湖州的乡先贤。酈千明先生著《沈兼士年谱》,前言里说沈兼士先生1949年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说了个事实。但兼士先生着实不该淡出公众视野的。“更使后生思老辈”,尹默先生的句子说出了我此刻的心情。故撷取若干掌故,以稍见兼士先生品学风貌。

沈兼士先生长期任职文学院院长,北平私立辅仁大学,校长是史学家陈垣先生。陈垣1940年1月7日写给长子陈乐素的信里有“文成必须有不容气之诤友指摘之”的句子,1939年9月16日给陈乐素的信里陈垣说:“行年六十,尚有人改文,至可幸也。”著述成而诚意请师友弟子指正的,沈兼士也是显例。《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是训诂学的名篇了,1933年1月发表在史语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里。此文沈兼士撰成后,以抽印本分请魏建功、李方桂、林语堂、吴承仕等给提意见。魏建功是沈兼士在北大教过的学生。6月21日魏建功给兼士先生写了两千来字的长信,谈自己的读后体会及意见,主要的篇幅是“敢陈一得”,最后说自己的这些意见“固皆先生夙所启发”——虽然表达的意见有所不同,但这说辞可以表示魏建功的尊师,也可见其在言语措辞上的“情商”比较高。8月18日,林语堂千余字长信专谈自己的体会及意见,既肯定论文的价值,主要部分则是“惟亦有数点意见,可供参考者”。9月5日吴承仕的信虽不长,“亦有数事可言”。吴承仕和沈兼士俱列太炎先生门下。1934年3月6日陈寅恪致信沈兼士,讨论兼士先生的这篇论文,最后说:“公之宗旨、方法,实树立将来治中国语言文字学之新基础,若能再取同系之语言以为参考之资料,则庶几可臻于完备之境界也。”陈寅恪于西洋语言学亦有造诣,故有此说。沈兼士和鲁迅年轻时也曾同在东京受业太炎先生,故兼士也请鲁迅批评。鲁迅3月26日在上海得此文,27日在致台静农的信里再次说:“兼士之作,因我是外行,实不敢开口,非不为也,不能也。”但鲁迅也是训诂学及古汉语文字学素养的,比如从他写的小说《奔月》《理水》里即可看出鲁迅是了解《说文解字》的。鲁迅1927年1月至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认定开设的4门课程,其中之一即属于文字学科目的:中国字体变迁史,每周讲课3小时。鲁迅一再谦辞,也说明了兼士所做的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研究工作。4月20日,蔡元培收到沈兼士所赠这份抽印本,阅读过后回信说“先生之作……缜密,吾无间然!惟‘右文’之名,弟尚怀疑”,建议“他日成书时,似可别选一名”。蔡元培年轻时也曾治《说文》。以上所述或可说明当年师友之间,有著述必请批评,谈体会要有所见,见解不一亦无顾忌;听的人也不以为受到冒犯,反而引为知己。

杨树达当时在清华等校任教授。

1933年12月23日日记里记载:“吴检斋来谈《说文》。渠亦始修正章先生《文始》,举数例甚精核;沈兼士古文字不能及也。”吴检斋即吴承仕,杨树达掌北师大国文系时,曾推荐吴承仕任教授。1934年2月22日,杨树达收到沈兼士托余嘉锡代送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抽印本,3月5日杨树达致信沈兼士,先赞“搜采之富,条理之密”,接下来就说了“献疑之处”两点,信后附上自己论文两篇《释赠》《释旒》,也是讨论声训语源的。杨树达信里末尾说:“弟与兄趣向相同,又幸同居一地,切磋必可相益,弟固极愿受教耳。”3月14日杨树达收到兼士复信,说杨树达“所见极是”,论文两篇“皆精审,《释旒》尤佳”。沈、杨二先生有著述必交流。杨树达年长沈兼士两岁。沈兼士论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1936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三号,同年英千明译成英文刊于辅仁大学《华裔学志》第二卷第一期。这也是汉语词族研究的名篇了。兼士将《国学季刊》的抽印本赠杨树达、陈寅恪、郭沫若请予批评。这一年11月12日,杨树达访沈兼士,兼士盛赞杨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之美,“辟一新途径”。杨树达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杨树达请沈兼士为这部书稿作序,12月17日序成,标题作“跋”。杨树达日记里说兼士将题文写作跋,“盖谦逊也”。兼士在序文里对杨著“有纠正处,又谓一字无定音定义”,杨树达表示兼士的说法“颇当”。兼士先生这篇序文的最后一段话是:“自知浅陋,无当大雅,诚以赏奇析疑,友朋至乐,聊复存之,以为大著之笺疏如何?”真是温文尔雅。1946年12月30日,杨树达收到沈兼士信,这封信是兼士感谢杨树达12月18日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撰文刊正兼士的文章。其时杨树达在长沙。兼士先生信里有云:“读《文史周刊·说瞿篇》,纠正拙文,获益匪浅,感刻!感刻!弟自在沦陷区患脑疾后,学殖益荒落。老友不遗在远,惠然赐教,何幸如之!”杨树达这一天的日记里感慨:“兼士虚怀若谷如此,真今世所希有也。”沈兼士1947年7月25日寄出他主编的《广韵声系》给杨树达,杨未及收到,兼士8月2日晚上突发脑溢血而病故。8月4日杨树达从报上得知噩耗,撰挽联:“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寄书方在道,遽哭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杨树达叹息:“今兼士死,余益孤特寡俦矣。”12月1日杨树达日记记录:“报载沈兼士葬香山。讲习故人,长眠地下,不可得见矣。呜呼!”

沈兼士病故的当晚,胡适在日记里记录兼士“一个很能工作的学者”。顾随当年12月7日刊于天津《大公报》的纪念文章,第三自然段的起首就说“先生是学者,而且是具有办事的心与力的学者”,接着写道:“北大国学所(应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故宫文献馆(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他一手奠定的基础……”这两事确实可以佐证兼士先生学术领导的眼界和能力。胡适赞誉兼士“很能工作”应该也主要是指这两项事,可能还包括抗战胜利后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完成华北教育文化机关的接受工作。柴德赓1947年8月18日发表在《益世报》上的纪念文章,称“沈先生是一个坦白刚直、热情而又富于正义感的人”,这也是可以举出例子说明的。陈独秀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当局逮捕,沈兼士与蒋梦麟、刘半农、马裕藻、周作人、钱玄同等12人联名致电教育部请求朱家骅以及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务恳俯念前劳,交由司法机关从宽办理”。鲁迅逝世,1936年10月30日出版的《中国学生》周刊第三卷第十期发表记者专访,沈兼士对记者说鲁迅



沈兼士

“对中国旧学问上,更具有深切的研究,伟大的眼光和见解,高于郭沫若等的造诣,不过先生不把他自己围在一个圈子里,而还要作更高的追求。他是最富于感情的,同时他的感情是热烈的”这是学院派做古典学问的学者的一个评论,坦白正直而深邃。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兼士先生为何会把自己的训诂学论文寄请鲁迅批评。

1946年中央研究院筹划首次院士评选,1947年3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根据这项组织法,中央研究院设置院士,院士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对所专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院士候选人提名在全国展开后,中研院史语所提出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沈兼士与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同列“中国文学”的推荐院士候选人。胡适1947年5月写的提名院士候选人名单里,中国文学门类也有沈兼士(这个门类里,胡适提名的另外两位候选人为杨树达、傅增湘)。沈兼士担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陈垣先生掌校,提名本校5位教授为院士候选人,沈兼士名列其上。可惜沈兼士1947年8月2日病逝,同年10月最后确定的院士候选人名单,里面也就不再有兼士先生了。

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的,对训诂学也算略微了解一些。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至今还有被引用、征引的。八九十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到今天还能够不断地被援引,这大概也可以证明兼士先生著述的长寿了。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亦在2014年列为单行本付梓。鲁迅自1926年9月离开北京后,曾两次北上探亲,1932年11月是第二次,11月20日晚上8点写毕的给许广平的信里说他这一次到北平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22日兼士先生邀请鲁迅到他执教的辅仁大学演讲,晚上又在东兴楼宴请鲁迅。23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及兼士邀请演讲和宴请之事,接着就说“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马衡之子马彦祥,1947年9月13日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纪念文章,引用时的话:“大先生是官吏,二先生是名士,三先生是学者。”这“三先生”指的就是沈氏三兄弟排行第三的沈兼士。鲁迅1932年11月19日晚上9点半在北平写毕的给许广平的信里说19日霁野、静农、建功“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这也可以印证“三先生是学者”这句话了。

做妾,可能就得要花几百两银子。如果看上一青楼女子,想弄到手,你就得给她赎身,还要打点关节,没几千两银子是办不成的。或许还得另买个院落,以便金屋藏娇。娶良家女孩为妻花不了几个钱,贱妓可要一大堆银两,这就叫品低而价高。你用不着为吃粗茶淡饭而心中郁闷,不平衡。你看老百姓家,喂猫给鱼,喂狗给肉,一家人很可能吃的是粗茶淡饭。用鱼肉养猫狗是一些人为了高兴,对你老兄有什么损失?世上许多博学之士,或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而动心去会钻营的人,可能肥得流油。你平心静气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千万莫让品低而价高的现象破坏了一颗心。

谭瑄看了信,细细回味,觉得世间之事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于是,他安心当先生,向他的学生教授四书五经六艺,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 史林偶拾

闻一多拒绝为得意弟子“走后门”

□ 张达明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喜欢一个叫臧克家的学生,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扶持。臧克家也将闻一多视为自己的恩师。每当写了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时,臧克家就会上门去请恩师提意见。凡是闻一多看上眼的诗稿,大都被推荐给《新月》发表,诸如臧克家的成名作《难民》《老马》,就是最先由《新月》推出而走红的。当时,臧克家的经济状况很窘迫,正是闻一多的帮助,让他用稿费渡过了难关。臧克家曾回忆说:“当时《新月》给的稿费极高,有一次发表了八行诗,就给了我四块大洋,这甚至比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要多。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闻先生的竭力提携,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名利双收这样的结果的。”

1944年秋,在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的臧克家写信给闻一多,希望恩师能施以援手,托托关系走后门,为他在西南联大谋取一

个教授职位。闻一多在当年10月12日的回信中写道:“本年联大未添一人,因米贴名额,教育部有限制。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要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其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足重你?你看远大点,勿再叨叨。”

闻一多的这封信,是师生之间实实在在的对话,没有半点的客套。虽然他非常看重臧克家这位得意弟子,但鉴于联大选聘教员极其严格的程序和苛刻的条件,认为臧克家其时还达不到一个教授“传道授业解惑”的标准,于是便坚决拒绝了为其说情走后门,还提醒“克家,不要浮囂,细细想去吧”。

关于这段经历,臧克家后来回忆道:“反思后理解了闻先生的苦衷,自己虽然写了几首小诗,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则几乎为零,闻先生拒绝说情的做法,实在是他心中有一文化良知的大天平在,也让我对他的人品愈发地敬重了。”

田汉闻过则喜

□ 颜士州

戏园家田汉是个知识很渊博的人,但他从不骄傲自满,对于别人的批评,他总是闻过则喜。

京剧《白蛇传》(原名《金钵记》)是田汉创作的。1951年,《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戴不凡的文章,批评了《金钵记》的不足。田汉看后,不仅没有火冒三丈,反而十分高兴。他认为,这篇文章里的观点,自己虽然不尽同意,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他还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文艺理论方面是很有功底,可以造就的,由此,萌发了爱才的念头。但是,谁是戴不凡?他又在哪里呢?田汉问了很多,都摇头不知。求才若渴的田汉并不气馁,在紧张的工作和著述之余,仍积极地打听戴不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查寻,田

沈尹默以曹雪芹为师

□ 吴吴军

民国初年,沈尹默就以书法和旧体诗词名闻遐迩。沈尹默曾经二度游学日本,归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而且,由于书法造诣极深,著名文学家徐平羽称赞沈尹默的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

与君展覆杭州人

□ 李健

唐长庆二年十月,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在任期间组织修筑西湖的堤坝,充分利用水利资源,保证千顷良田的灌溉,还撰写《钱塘湖石记》镌刻于石上,向后人详细介绍如何管好用好湖水。另一重要政绩就是疏浚了李泌留下的六口水井,确保城中百姓的生活用水。

萧悦、殷尧藩是白居易的属下,位卑禄薄,生活窘困,寒冬来临之际,白居易让人缝制了两条厚实的棉袍相赠。两人非常感动,投诗致谢。白居易回赠《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我有大裘

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缁亦非纴,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简政宽刑、休养生息、兴修水利、治理西湖,以法度仁爱治理州郡,这就是白居易的执政理念。

长庆五年白居易任期已满,在《赠州民》诗中他说道:“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早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把百姓的甘苦冷暖放在心头,这样的官员才能让世人永久怀念。

◎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上流行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指导工作。图为解放军战士和工人在一起交流学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照片提供者:朱积良

◎ 史林探微 □ 张蓬云

朱彝尊(1629~1709)浙江嘉兴人,清康熙朝为官,后离京归故里。同时代人称他:“朱子诗才隽逸,文尤跌宕可观。然性好饮酒。”(清·沈琬《说铃》)其一生编著颇丰,时人称之浙西词派之首。

朱彝尊性格洒脱,为人正直。他有个朋友叫谭瑄。在京城时,谭瑄在一个富人家教书。这个有钱人喜欢唱地方小曲子、听点逗乐的东西。于是,他又请了一个会唱小曲的来家演唱,并且还让他来教小孩子们说唱。日子一长,谭瑄发现这家的主人给自己吃的全是粗茶淡饭、清汤菜蔬。而那个唱歌的人,则顿顿有鱼肉、美酒白饭。他心里很不平衡,认为教四书五经的人身份比唱小曲的高啊,我是先生(老师),他是艺人,怎么待遇上还低人家几个档次?于是,他将心中的苦闷写信

说给朱彝尊。

朱彝尊很快就回了信。朱在信中先是劝慰朋友千万不要因此而生气。接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必须弄明白你在社会中是什么地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国学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没办法的事;唱小曲演小戏,甚至耍活宝、出洋相,你觉得没学问,可有人喜好,这也不由人。切记,获得知识、学问,是件很吃苦费劲的事。

他还跟朋友说:“君子以类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类而辨之。君子自审其分处焉。娶妻纳采,徧皮纯帛可也,至娶妾则百金,落管妓籍则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单之丰,譬以鱼饲猫,肉喂犬。于兄何损?”(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

朱先生用生活中的事举例劝导朋友。他说人要娶妻子,给女方送些彩礼,做几件新衣服和被子就行了,花钱不多。而要买个年轻的女人

朱彝尊风趣劝朋友